

抗战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徐国荣, 车孟杰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世人眼中陶渊明既是隐士也是饮者, 而且也并非完全忘怀于政治; 他的诗歌风格既有平淡自然的一面, 也有豪放的一面。这些解读在不同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均有体现。尤其在抗战时期的特殊语境下, 学者文士对陶诗的欣赏以及对陶渊明形象的理解更是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其不仅契合于民族救亡的主题, 也让陶渊明这一诗人形象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学价值, 在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之意义。

关键词: 陶渊明; 抗战文化; 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6)05-0135-06

在中国文学史上, 陶渊明历来以隐士形象而闻名, 陶诗也以诗风平淡自然而著称。但陶诗与陶渊明形象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解读, 朱熹谓其“豪放”^[1], 鲁迅言其“金刚怒目”^[2]。在不同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从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寻获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而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 也同样如此。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学术语境里, 陶渊明及其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诗性灵魂、人格气节, 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对战时的作家和学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津津乐道于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 在战火硝烟的苦难岁月里追寻陶渊明诗意的足迹, 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但是动荡而残酷的战争现实却将他们心中的诗意家园冲击得支离破碎。对此, 他们将目光投向陶渊明诗文中抗争现实的一面, 通过对陶渊明进行学术研究, 以契合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表达他们对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的现实关怀之情。因此可以说, 陶渊明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新的时代文化意义,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人格魅力之感发与自由精神之共鸣

陶渊明之所以得到古今文人学者几乎一致的

推崇, 除了其诗歌成就本身之外, 更重要的乃在于其人格魅力的感染。处于抗战时代的作家和学者对陶渊明的理解也是如此, 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或在日常生活里, 常常赞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又甘于贫穷的高尚人格。特别是处于人命危浅的战乱时期, 陶渊明这个古代诗人的形象对战时华夏民族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废名一直对六朝人物热爱有加, 对陶渊明更是如此。他不仅在创作中借鉴陶诗的风格, 自称“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3], 还引陶渊明为隔代知己。如他在读到《闲情赋》“愿在昼而为影, 常依形而西东, 悲高树之多荫, 慨有时而不同”的时候, 他联想到陶渊明“大约是由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 自己又孤独惯了, 一旦走到大树荫下, 遇凉风暂至, 不觉景与罔两俱无, 唯有树影在地”, 并指出自己“亦有此经验”, 在陶渊明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又在读到《影答形》“与子相遇来, 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 止日终不别”的时候, 说自己与陶公可谓“莫逆于心”^[4], 千载之下, 尚友渊明。而在抗战时期, 废名所创作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 其中也是多处借用、化用了陶渊明的事迹和诗文, 流露出莫须有先生即废名本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佩服之情。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如下:

莫须有先生佩服陶渊明, 陶渊明那样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换一句话说他瞧不起当时的国家社会政府官吏, 而他那样讲究家族关系, 一面劝农, 自己居于农人地位, 一面敦族, “悠悠我祖, 爰自陶唐”“同源分流, 人

收稿日期: 2016-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学术史意义下的六朝文学研究”(14BZW044)

作者简介: 徐国荣(1965—),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车孟杰(1987—), 男, 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

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在魏晋风流之下有谁像陶公是真正的儒家呢？因为他在伦常当中过日子。别人都是做官罢了，做官反而与社会没有关系。农人是社会的基础，农人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这里了。否则是做官。一做官便与民无关。所以中国向来是读书人亡国的，因为读书人做官。中国的复兴向来是农民复兴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动摇，他们始终是在那里做他们的农民的，他们始终是在那里过家族生活的。中国古代的圣人都是农民的代表，故陶诗曰：“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后代做皇帝的也以知道稼穡艰难为唯一美德了。难怪他们总是喜欢同乡下人喝酒：“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他是知道农人的辛苦，而且彼此知道忠实于生活了^[5]1024。

在战时居住于黄梅乡间的废名即莫须有先生，得以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触，因而他深知农民兄弟之间手足情谊之可贵，以及他们所潜藏的伟大力量。他所说的“中国的复兴向来是农民复兴的”“中国古代的圣人都是农民的代表”，可谓饱含深情的箴言。而那位宁愿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官，也要身居乡村做农民的陶渊明，则让废名大为激赏，也视其为心中的圣人。因此他在小说中以陶诗赞美乡土稼穡，并通过描写陶渊明与农人喝酒共乐的场景，传达他对农民兄弟的歌颂之意。

同样喜爱陶渊明的朱自清，不仅对陶诗进行了拟作，^①而且在西南联大期间还专门开设“陶渊明诗”的课程，对战时陶渊明诗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更是践行着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品德操守，“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躲开了国民党在昆明的‘司令’‘要人’的拜访，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在那些趋炎附势、巴结官场的文人面前，在那些对抗战悲观失望的颓废文人面前，高洁地站立着。”^[6]朱自清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陶渊明，他的这种高洁行为，正是在生动地诠释着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令的傲骨气节。

朱陈回忆起父亲朱光潜时曾提到，朱光潜“在抗战前就从陶潜的《时运》诗序中的‘欣慨交心’这句话取出‘欣慨’两个字，作为他的室名”，同时还“请两位会篆刻的朋友替他篆刻了‘欣慨室’三字图章，又请马一浮替他篆写了‘欣慨书斋’四字的横幅”^[7]。朱光潜在战时写的《陶渊明》一文中指出，从“欣慨交心”一语中，可以体会

陶渊明精神生活的淡泊清醒以及内心世界的透彻明朗“他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底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底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底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8]朱光潜以“欣慨”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淡泊而明朗地走过了痛苦的战乱岁月，足以见出陶渊明对其影响的深刻。

其实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之所以受陶渊明人格魅力之感染，正是源自于他们心中对自由精神的诉求。身处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以超然出世的审美态度审视着人生，对生活进行有距离的观照，不仅有效地化解人生中的诸般烦恼，而且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由以及美的享受”^[9]，其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由而美的人格魅力，是魏晋风度的绝佳代表，因此正契合战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宗白华就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颇为青睐，认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洋溢着生命，神情超迈，举止历落，态度恢廓，胸襟潇洒”^[10]之自由精神，能够在抗战时期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所以，宗白华通过撰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所具有的自由精神予以旌表，并用以鼓舞民族抗战的斗志。^②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陶渊明人格魅力的影响，他们在陶渊明身上寻获与时代相契合的自由而美的精神。因此，陶渊明也成为他们创作与研究的重要话语资源。

二、苦难中的诗意追寻与心灵抚慰

在时局动荡不安、国运多舛难测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在连天炮火中颠沛流离，不仅要面对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还要遭受严峻的生命威胁，他们的内心自是苦闷而压抑。但即便是在如此纷扰不堪的环境之下，他们也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的构筑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求。而千年前身处晋宋易代这一同样混乱而黑暗时期的陶渊明，以超越时空的诗性灵魂激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情感共鸣。因此，他们不仅将陶渊明及其诗文融入自己

① 朱自清作有拟陶诗《陶潜归田园居》《饮酒》等，收录在其《敝帚集》中。

②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原刊于1941年1月《星期评论》第10期，此后宗白华将其修订，发表在《时事新报》1941年4月28日《学灯》第126期上，同年5月5日《学灯》第127期又续登此文。一篇文章被连续刊登两次，可见宗白华对此文之重视。

的文学创作,还对陶渊明进行了别有创见的深入研究。读陶、和陶、学陶、研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灵抚慰。

这种心灵抚慰体现在陶渊明诗文中那份历经千载而依旧触动人心的精神力量。钱穆回忆自己在动荡年代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之时,也谈到自己曾受陶渊明文学精神之涤荡“在抗战时,余只身居云南宜良山中上下寺,撰写《国史大纲》。每逢星期日,必下山赴八里外一温泉入浴,随身携带一陶集,途中泉上,吟诵尽半日。余之宁神静志,得于一年之内完成此书,则实借陶集之力。不啻亦如归去来,安居桃花源中也。”^[11]面对战时艰难困苦的写作条件,钱氏从陶渊明诗文中获得了精神的安宁,将战火纷飞的敌后环境当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以此平复心情,开展学术研究。陶渊明诗文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而陶渊明诗文之所以能触动人心,在于其独绝千古的自然冲淡之诗性韵致。正如何一鸿所言,陶渊明“把他的生活和情感,都融化在大自然里,使其与自然凝结成一片,令人分别不出什么是他的诗,什么是自然,他的诗只是一片浑然的天机而已”^[12]。陶诗的这种自然冲淡从更深一层来说,是源于其内在性情之率真。郑骞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字字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绝非士大夫阶级反串的作品所能及”^[13];廖秉雄也认为陶诗“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一个真字。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就本色炼得入细,就浅景写得入妙,就浅意写得入奥,洗尽铅华,自然发艳”^[14]。陶渊明本着性情而创作的诗歌,流露出的是毫不掩饰的真意趣,自然而成,无所造作,这便是人们对陶诗最为称道之处。

十分欣赏陶诗本真的夏仁虎曾作诗云“诗人百病悉可治,唯有一俗称难医。……以真医俗实上药,导其先者渊明辞。”^[15]夏氏指出诗人作诗最忌“俗”,而祛除“俗”的最佳良药为“真”,其先驱则为陶渊明的诗歌。因此,具有真性情的陶诗便深受夏仁虎的青睐。从1941年夏开始,历经一年时间,夏仁虎创作了《和陶诗》四卷本,基本对陶渊明的每首诗歌都进行了追和。其诗如《孟夏苦旱晦日微雨》(用《读山海经》韵)云:

孟夏已苦暵,庭草尽凋疏。凉风忽西来,微雨洒我庐。小窗喜多明,披襟展素书。巷穷少宾辙,门息长者车。厨烟低不起,犹办笋与蔬。朝朝数米炊,饱与童仆俱。颇闻旱象成,忍见流民图。笈笈不润物,差胜叹焚如^[16]。此诗写于1942年,是年夏仁虎任教于北大。

诗中记录了当年发生在北方的大旱,及其所造成的严重饥荒。面对着聊胜于无的微雨,夏氏喜出望外,但也为身处苦旱灾殃的人民感到心焦。抒写微雨之幽美的同时,不乏心系苍生的悲悯情怀。

同年,另一位诗人彭作楨也出版了一本《和陶集》。他自称“予年来饮酒后辄吟陶诗……百忧都解,其感人有不可思议者”^[17],因而尽和陶诗,表达对陶诗的喜爱之情。其诗如《饮酒二十首》其一云:

平生不解饮,客来强饮之。自恨终日醒,不如人醉时。六十忽超然,性天见于兹。谈理忘同异,闻者翻骇疑。区区何以答,杯酒常独特^{[18]26}。

此诗颇具陶渊明《饮酒》诗以酒为乐、忘怀世事的韵味。可以说,夏、彭二人的和陶,不仅反映出诗人在苦难的抗战岁月里以陶诗驱除内心的压抑,也体现了陶诗独特的文化张力成为动乱时代人们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除了和陶诗,作家还将陶渊明写进小说,通过陶渊明这个人物形象传达出战时知识分子对陶渊明诗意人生的向往。如沈天鹤的《陶渊明》就塑造了一个淡泊清宁的陶渊明形象。小说中写道:

他走到东园,菊花盛开得像一抹五彩的云霞。阳光洒在上面,绚烂夺目。他沿着花丛慢慢的走去,在每一株花前总要停驻一下,凑近去闻一闻香气,更把枝叶儿轻轻拿起来细看有无损伤。菊花是他的心爱的东西,他是像慈母般在爱抚它们呢!最后他摘下顶小的一朵,花瓣儿细长得像一条条丝带的,把来吻了一下,佩在襟上。末了,他走到一棵夭矫如虬龙的青松跟前,依着干儿向菊花凝视了多时,忽然枯瘠的脸上浮出一个会心的微笑。随即把手杖依在树干旁,仰身在树下躺着了,树的枝叶像一把青翠的大伞张护住他,他仰视着头上的天空,似乎觉得它比平日更来得高澈明澄,菊花的香味,他闻来是觉得比任何种的花香都来得清醇,他这样躺着,几天来挨饿的肚子,整个儿给自然的美所醉饱了^{[18]104}!

这段文字以小说笔法描绘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为人们呈现了一幅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抚孤松而徘徊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卷,其不仅生动地反映了陶渊明身上具有的“忧道不忧贫”的旷达洒脱品质,也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诗性情怀。

此外,给战时人们带来诗意情怀的还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片与世隔绝的乐土里,风景美妙如画,没有王朝更迭,没有战争动乱,人们

享受着安详融洽的幸福生活,令人神往情动。因此桃花源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诗意栖居地,被他们称之为“东方的乌托邦”“里面充满着无为而治的精神……一切的生活姿态,完全任其自由”^{[12]161}。而作家们也纷纷建构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由乌托邦,从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并让思想洒脱无拘地徜徉其中,以此与苦闷的战乱现实世界决裂。

如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写莫须有先生在战时流落黄梅乡间,感受到的是民风淳朴,乡民们“不知今是何世”^{[5]822},仿佛身处桃花源。面对着战争,他们保持平静的心态。即便“头上都是日本佬的飞机”,他们“一见了日本佬都扶老携幼地逃”,可他们依然乐观地生活,相信“日本佬一定要败的”^{[5]825},不受战争困扰,颇具自然无为的桃源心境。除了废名笔下的黄梅故乡,还有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师陀描绘的果园小城等,都代表了抗战时期作家所创造的现代版“桃花源”。然而,日军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还是让昔日美好的桃花源陷入万劫不复之地。1939年,沈祖棻在重庆遭遇日军空袭,他以《霜叶飞》一词记云:

晚云收雨。关心事,愁听霜角凄楚。望中灯火暗千家,一例扃朱户。任翠袖、凉沾夜露。相扶还向荒江去。算唳鹤惊鸟,顾影正、仓皇咫尺,又催笳鼓。

重到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许?乱飞过鹤拂寒星,陨石如红雨。看劫火、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况有客、生离恨,泪眼凄迷,断肠归路^[19]。

即便是和谐宁静的桃源,也会沦为战争机器的炮灰,成为一片狼藉不堪的废墟。而此时战火纷飞之下偌大的一个中国,已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遑论憧憬幸福的未来。知识分子们心中的诗意家园,也如同战火中的华夏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三、家国情怀与现实抗争

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威胁以及诗意人生和精神家园所受到的战争摧残,知识分子们奋起抗争,以文字为战斗武器,通过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唤起国民共同抗敌救国的民族情感。而在陶渊明接受方面,他们则更多地阐扬其心中的家国情怀及其诗文中所具有的抗争现实之精神。

置身晋宋政治变局之中的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

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20],因此他即使归隐陇亩,也无法完全忘却世事。陈寅恪引沈约之“忠愤说”肯定了陶渊明心中所具有的政治情怀“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21]他之所以选择遁归田园,过风轻云淡的隐居生活,则在于污浊之现实让其无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恰如何一鸿所说“历代的批评家,都把渊明归于隐逸之列,其实这种见解也是不正确的。他并不是没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也不是没有政治的理想,这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到的。他之所以隐遁田园而不仕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腐象日深,积重难返,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投身在自然的怀抱里,春耕秋获,饮酒赋诗,来消磨他的岁月。”^{[12]155-156}

在诗意的田园生活里,陶渊明并没有忘怀家国天下,他将自己的政治情愫寄托在《述酒》《拟古》《咏荆轲》等诗篇中。尤其是《述酒》诗,自汤汉注陶诗起,就被认为其中深刻寄寓了陶渊明不能忘怀前朝政事的忠愤情绪。后来鲁迅也说:“《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22]1937年冬,储皖峰写作了《述酒诗补注》,对这首诗作出进一步的注解说明,以彰显陶渊明的政治情怀。他认为陶渊明通过曲折隐晦的手法,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世乱之悲与家国之思,“以酒为名,而实则悼晋祚之式微,愤刘裕之篡篡也”^{[23]5},寓含着丰富的政治色彩。其实这篇《述酒诗补注》是储氏对当时世道有所兴发而作。他在该文的开篇便颇有感慨地说明撰写此文的心迹。他指出《述酒诗》“此诗不明,则靖节之心事不能表白于世,每一展卷,求其说而不得,为之慨焉太息”,又说“今年秋海宇不宁,杜门养病,意有所郁结,托之卷轴以自遣,于是发愤取陶诗读之,于《述酒》之篇反覆玩味,以意逆志,似颇有所解,遂稽之史传,参之载籍,为补注一卷,极知浅陋,无当大雅,姑以寓吾之意而已。”^{[23]1}时值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滞留在北平的储氏“意有所郁结”而作《述酒诗补注》,其中潜藏的忧国伤时之意,正是因储氏念及陶渊明眷恋故国之情而起。

可以说,陶诗中以《述酒》为代表的这一类诗歌,在战乱时代具有振奋人心、干预现实的积极意义。施若霖指出,对于陶诗“不能仅看到他底一面——消极的有闲,却也要体会到他底愤慨的寄托所在”^{[24]32},特别是对《咏荆轲》《拟古》等这些

充满激昂斗志的诗歌,要充分体会诗中“愤怒、悲哀、痛苦、醒会、叹息”的沉壮格调,才能真正而全面地理解陶渊明的人格。同时,施若霖还不无讽刺地说“‘年轻’的陶潜在现在要隐藏到深山里去,‘悠然见铁鸟之下大卵’(仿新象征派诗句)只有死路一条”,认为当时处在抗战时局中的青年人不能仅一味追求冲淡和平的创作,而是应该投入到现实血与火的战斗中,“活泼地勇壮地继续抗战下去”^{[24]33}。可见,在战火蔓延华夏大地的苦难岁月里,饱含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陶渊明愤世忧国的家国情怀及其诗中豪壮雄奇的风格,以警醒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奋起救亡图存,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和人格力量,担当起民族和时代赋予的重任。

然而,在战乱岁月里,却有一些知识分子难以坚守气节,周作人即是其一。在抗战之前,周作人也是以隐士身份自居。对比他与陶渊明,堵述初认为两人都具有共同的“怀古的情绪”。

一个人不能现实中求得满足和安慰,结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怀念过去,一条就是憧憬将来。周作人和陶渊明都不期而然地走上那怀念过去的路,这便是他们怀古之所由来。但是他们这种怀古,却又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乃是对现实的反抗,因为他们仍是各自在那种现实的社会里认真地生活着。于是矛盾就出来了,因为现实的认真生活和过去的怀念是有冲突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叛徒和隐士合一的生活^{[25]28-29}。

陶、周两人都怀念过去,然而怀念过去并非逃避现实,他们都是关注现实却不满现实而有所反抗,这是“叛徒生活”。至于“隐士生活”,则是“陶渊明的‘饮酒’与周作人的‘闭户读书’”。陶、周两人并非甘心做隐士,而是通过或“饮酒”或“闭户读书”来反抗现实,“拿隐士作帽子,来达到作叛徒的目的”^{[25]29},此即为“叛徒和隐士合一的生活”。由此可见,抗战之前的周作人还是颇受时人敬重的。可是抗战爆发后,周作人却真正地过上了“叛徒生活”,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苦衷与隐曲,这终究是个污点,且此时的“叛徒生活”已非堵述初所说的“对现实的反抗”,而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自甘沉沦。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周氏虽不愿为五斗米而向敌折腰,但依着长守在‘苦茶庵’里,认魔手下的北平犹如今日的‘桃花源’,而始终老于是乡,周作人之不如陶渊明,于此可见。”^[26]这时再比较陶、周两人,人们对陶、周人格的评判已有高低之别。

因此,具有坚定人格气节和深厚家国情怀的陶渊明,也就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心中的伟大民族诗人。而陶渊明也被他们写进文学作品,借以抒发现实抗争之感。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十分称颂屈原,通过创作历史剧《屈原》弘扬时代战斗精神,激发民族爱国热情。而具有高洁人格和家国情怀的陶渊明,同样受到郭氏的景仰与推崇。他在《题傅抱石画八首》其二《中国有诗人》里,对这两位伟大的民族诗人进行了热情歌颂。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同遭阳九厄,刚柔异其操。一如云中龙,夭矫游天郊。一如九皋鹤,清唳澈晴朝。一如万马来,堂堂江海潮。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一悲举世醉,独醒赋离骚。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一随化俱尽,情话说渔樵。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譬之如日月,不论鹏与雕。早久焦禾稼,夜长苦寂寥。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27]332-333}。

《题傅抱石画八首》是郭沫若在1942年为友人傅抱石创作的一组人物画所写的题画诗,《中国有诗人》即是其中一首。郭沫若指出,傅抱石的这组人物画“如屈原,如陶潜,如野遗与费密游,如鹤野题石涛画,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28]。与傅抱石寄情于画一样,郭沫若亦是寄情于诗而别有所托。郭沫若笔下的陶渊明和屈原相比,虽然一是“自弃”,一是“保身”,但他们在世道动乱、家国危亡之时,“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都有着孤高傲岸的高洁人格和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郭沫若通过诗笔描写屈、陶两位伟大诗人的人格,不仅饱含着他发自内心对诗人的敬慕之情,也意欲以诗人的人格魅力激励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

此外,郭沫若在这组题画诗的第三首《题渊明沽酒图》中,还对陶渊明进行了别致的描写:

苍苍古木寒,蔽束难可遮。前村沽酒去,薄酒聊当茶。匪我无鸣琴,弦断空咨嗟。匪我无奇书,读之苦聱牙。悠悠古之人,邈矣如流霞。平生幽窄思,楮上著残花。照灼能几时?吾生信有涯。呼童急急行,莫怨途途赊^{[27]333}。

诗中以简洁的笔法刻画出高旷洒脱的陶渊明,让人如睹目前。同时,郭沫若在诗中还通过描写陶

渊明,指出面对有限的生命,人生应该奋起前行,只有恐为人后的精神,才能征服漫长的人生路途。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危机之际,知识分子之“爱陶”更愿取其积极有为之面,有其特殊的文化抉择。

而小说中的陶渊明形象同样寄寓着作家们强烈的时代精神。除了废名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对陶渊明进行颇具现实意义的解读之外,沈天鹤的《陶渊明》也是别有寄托。小说中写陶渊明和一位邻居老农饮酒时有一组对话:

“老先生!”那邻老对渊明略有菜色的瘦脸,褴褛的衣衫注视了好一会,忽然热情地说道:“我倒要劝劝你,古人说得好:‘世人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你老先生何不稍稍随俗浮沉些儿,再去出仕一次呢!”

这时渊明酒正喝得半酣,听了邻老的话,心里不禁想起我岂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事来,因连忙微笑了一下,回答着说:“你劝我去做官吗?做官固然有味的,做得清得名,做得浑得利;浑得手腕灵敏一些,还可名利双收!可是这样的官味我可辨别不出什么好处来,何况做官的人能有几个真替老百姓打算,他们大多是要搜刮民脂民膏的。我呢,我自己觉得不配去做官,我很记得三十四岁做刘牢之参军时,就不耐烦得什么似的,甚至于看到飞鸟游鱼的自由自在,也觉得我自家是落在尘网中了,心里要起疚愧……”^[18]

这组对话虽然是对陶渊明不肯为官从政事迹所进行的演绎,但是从中却折射出作者对当时国民党官场的批判之意。小说写于1941年,时值抗战相持阶段,面对人民的深重苦难,国民党官僚们无所作为,却日益贪污腐败,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过着贪婪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小说中所言的“做官的人能有几个真替老百姓打算,他们大多是要搜刮民脂民膏的”,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贪腐内幕的写照。作者借小说人物陶渊明之口,传达出反抗黑暗现实的时代之感,别创一格,颇能启人深思。

综而言之,出现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笔下的陶渊明,是一位有血有肉、充满人格力量的伟大民族诗人,他所创造的诗意田园生活安顿了战时人们痛苦的灵魂,他身上具有的家国情怀与“金刚怒目”式的战斗精神激发了战时人们抗争动乱现实的意志。因此,知识分子们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不仅饱含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时代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25.
- [2] 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6.
- [3] 废名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
- [4] 废名集: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62.
- [5] 废名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6] 陈竹隐. 追忆朱自清[C]//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6.
- [7] 朱陈. 父亲的“欣慨”[C]//朱光潜纪念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52-253.
- [8] 朱光潜. 陶渊明[C]//现代文录.北平:新文化出版社,1946:35.
- [9] 陈方力,焦树民. 陶渊明与魏晋风度[J].江西社会科学,1999,(12).
- [10] 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84.
- [11] 钱穆. 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08.
- [12] 何一鸿. 陶渊明评传[J].新东方,1941,(4).
- [13] 郑骞. 陶渊明与田园诗人[J].文学集刊,1943,(1).
- [14] 廖秉雄. 陶诗研究述略[J].国文评论,1944,(1).
- [15] 夏仁虎. 枝巢编年诗稿:第11卷[M].1934:9.
- [16] 夏仁虎. 和陶诗[C]//国学家夏仁虎.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30.
- [17] 彭作楨. 和陶[M].成都:新新新闻印刷部,1943:1.
- [18] 沈天鹤. 陶渊明[J].乐观,1941,(6).
- [19] 沈祖棻诗词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61.
- [20] 袁行霈.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J].中国社会科学,1990,(2).
- [21]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1945:54.
- [22]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8.
- [23] 储皖峰. 陶渊明《述酒》诗补注[J].辅仁学志,1939,(1).
- [24] 霁长. 田园诗人陶潜批判[J].文艺世界,1940,(2).
- [25] 堵述初. 周作人与陶渊明[J].艺风,1936,(4).
- [26] 戎君. “知堂”与陶渊明[J].青年大众,1938,(1).
- [27] 郭沫若. 潮汐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 [28] 郭沫若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38.

[责任编辑:修磊]